

古人类论文集

——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汇编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古 人 类 论 文 集

——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汇编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编

科 学 出 版 社

1978

内 容 简 介

本论文集是197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上宣读的论文汇编。其中收集论文共15篇，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论述的心得体会、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有关古人类的地层、古生物以及绝对年代的测定等方面。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文集包括了在会上报告的有不同观点的大部分文章。这些论文中对古人类学的研究作了回顾和总结，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文集可供人类学、生物学、考古学、地质学、历史学、博物馆工作者参考。

古 人 类 论 文 集

——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
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汇编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编

*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78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197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 1/4 插页：11
印数：0001—13,330 字数：233,000

统一书号：13031·791

本社书号：1136·13—16

定 价：1.75 元

编 者 的 话

1976年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光辉著作写作一百周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会。会上报告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论述的心得体会和近年来有关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现在汇集成册出版，这样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开展，会是有益的。

有关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目前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本论文集包括了大部分在会上报告的有不同观点的文章。部分文章已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在此不再刊载。

由于“四人帮”对理论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我国的古人类学工作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有待我们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肃清其流毒。我们相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我国的古人类学一定会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起源理论作出贡献！

1977年1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iii)
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吴汝康 林圣龙 (1)
围绕人类起源学说的阶级斗争	王 维 (10)
光辉的真理 前进的灯塔	甄溯南 (17)
人类的童年时期	潘其风 韩康信 (22)
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	吴新智 张银运 (28)
二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邱中郎 李炎贤 (43)
论巨猿与人类的关系	王令红 吴茂霖 张银运 (67)
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	李炎贤 文本亨 (77)
云南元谋人化石产地的综合研究	袁振新 张兴永等 (94)
云南元谋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	林一朴 潘悦容 陆庆五 (101)
云南元谋盆地发现的旧石器	文本亨 (126)
泥河湾层中的新发现及其在地层学上的意义	卫 奇 (136)
蓝田人地层年代的探讨	程国良 林金录 李素玲 (151)
周口店新洞人及其生活环境	顾玉琨 (158)
湖北郧县猿人化石地点的发掘	许春华 (175)

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吴汝康 林圣龙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76年写作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光辉文献，到今年已是一百周年了。在这篇光辉文献中，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的观点出发，精辟地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伟大理论，揭示了人类起源的根本规律，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这是人类起源认识史上的革命的变革。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也是我们同人类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这篇光辉文献的最后一部分，恩格斯还把劳动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要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一直到“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的时代背景

正如恩格斯在这篇光辉文献中所指出的，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随着阶级对立的出现，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的身分却被降低到“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劳动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并不是幸福和解放，而是贫困和奴役。生产劳动成了“奴役人的手段”，历史上有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雇佣劳动。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便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在近代雇佣劳动制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对劳动者的奴役更是发展到了顶点：“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一极，在资产阶级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无产阶级方面，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这就导致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象一声春雷，震撼着全世界。1871年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英勇尝试，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巴黎公社

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时期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需要，积极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党，并在此过程中，对各种机会主义展开尖锐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在繁忙的革命活动中，曾经打算写一本以《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为题的内容较广的著作，阐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便从劳动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的问题，而把从猿到人的论文用作这本著作的导言。后来，恩格斯把这个标题改为《对工人的奴役。导言》。但是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终于给他已经写作的导言部分加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标题，归入了《自然辩证法》材料中的第二束。

另一方面，恩格斯的这篇光辉文献也是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为了批判唯心主义世界观并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人类起源的根本规律而写作的。

人类起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十八世纪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特创论与进化论的斗争。特创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是林耐和居维叶。与此相反，以拉马克为代表的进化论者则认为，一切现代的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古代的生物进化来的，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由简单发展到复杂。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总结了当时的生产实践经验和生物科学各部门的成就，把进化思想提高到更完备更成熟的阶段，从而揭示了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确立了进化论。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以极丰富的事实论证了一切物种都是由过去的物种进化发展来的进化学说，给了宗教神学以致命的打击，粉碎了生物是由上帝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进化论推进了人类起源的研究。1863年，英国学者赫胥黎发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提出了人、猿同祖的理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论证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根据，指出了人类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人类是由一种古猿进化来的。

进化论的确立是唯物主义观点的胜利，它打倒了特创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在科学上的统治，把人类起源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进化论在反对宗教神学和特创论的斗争中具有进步的意义，并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自然科学的根据，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这场涉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给予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很高的评价。同时恩格斯又敏锐地看出了，达尔文虽然唯物地解决了人类由何而来的问题，但是由于唯心主义的影响，却“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为了科学地解决人类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恩格斯写作了这篇光辉文献。

在上述背景下，恩格斯写作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未完成稿。

二、恩格斯的这篇光辉文献的伟大意义

在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导言》等经典著作中已多次阐述了有关劳动的各种问题及其对人类的重要作用。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恩格斯全

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劳动在人类产生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恩格斯首先指出：地质时期第三纪的古猿，“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直立行走意味着“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因此，“我们的祖先”，即“过渡期间的生物”，“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恩格斯又指出：“手并不是孤立的。”由于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因此“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于是，语言产生了。“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恩格斯又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总之，“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正因为劳动在人的一切具有特征性的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恩格斯说：“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如前所述，在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之前，达尔文已经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达尔文在研究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时所达到的唯物主义观点只是“**自然科学家的自发唯物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的世界观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而在他的理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特别是当他由研究生物的进化转而探讨人类的起源，也就是由自然界进入社会历史的领域时，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社会观是唯心主义的。

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他在研究生物进化时是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据以工作的

理论”(《自传》)的。达尔文在研究人类起源时也是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并把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观点全部应用于人类。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中，达尔文多次重复了这样的观点：“一切动物都有繁殖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人的祖先也必如此，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达尔文认为，人的一切特性包括人的体质特征、语言、智慧、社会性、心理、情感、伦理道德等等都是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还认为，人类和动物的一切差异，以道义感或良知为最重要，这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由此可见，由于达尔文把支配生物进化的生物学规律全部搬用于人类的起源，因而虽然他得出了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正确结论，把人从上帝手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却又错误地把人动物化，不了解什么是人和动物的真正的本质区别，也就弄不清什么才是人类起源的主导因素。因此，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他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他对人类起源问题只回答了一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在关于什么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个问题上，唯心主义观点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一般都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有高度的智慧，人类的特点就在于有特别发达的脑子。直到现在也还流传着类似的观点。1828年，也就是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之前约半个世纪，世界著名的胚胎学家冯贝尔写道：“直立姿势只是脑子高度发达的结果，……人和其他动物的一切区别都在于脑的结构”。一百年以后，即1928年，也就是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之后约半个世纪，英国的著名人类学家史密斯还认为：“使猿变成人的不是直立姿势的采取，也不是有音节语言的发明，而是脑的逐渐完善和心智结构的缓慢的确立，躯干的直立和语言只是伴随的若干表现而已”。近十年来，苏联的波尔希涅夫还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脑内出现了第二信号系统，这样语言和抽象思维才有可能。他认为，只有新人才是人，新人以前的尼人和猿人虽然已能制造工具和用火，但都不能算人，而只是能制造工具和用火的极度发展的、最高等的动物。波尔希涅夫本人已在1971年死去，但他的理论在苏联还被吹捧成“是真正的革命性的”理论。

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对立，“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于是便产生了把人类的头脑和心智放到了第一位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然而，恩格斯远远超越于包括达尔文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科学家的不仅仅在于这一点。恩格斯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即使在他论述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的文章中，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的光芒。

如前所述，恩格斯的这篇光辉文献原来是作为《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导言，是为了说明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首先从历史的观点考察劳动的起源和发展而写作的，因此恩格斯自然不会把讨论的问题仅仅局限于文章题目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而必然要由此引导到他更为关心的、具有更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劳动的奴役以及如何

从劳动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问题。因而，在阐明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以后，恩格斯立刻就把问题引到了生产活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特别是社会影响，并且从问题的这样一个角度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后来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阿拉伯人学会蒸馏的酒精成了以后被发现的美洲土人逐渐灭种的主要工具；哥伦布发现美洲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蒸汽机的发明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最后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虽然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也就是说，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还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也就是说，将导致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

正当恩格斯要把问题进一步展开、要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无情的剖析和深刻的批判时，手稿到此中断了。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一直到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这就是恩格斯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所阐述的主要思想。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劳动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恩格斯的教导对于全世界今天还在受压迫、受奴役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我国人民仍然具有十分巨大的现实意义。

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恩格斯又深刻地指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这是对人类的起源和未来的极其概括的科学总结。这里所说的“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就是恩格斯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三、古人类学的新发现证实了劳动创造人类的光辉论断

在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的时候，人类起源研究所依据的主要直接证据的人类化石发现还很少，当时知道的主要只限于1856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和1868年在法国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化石，并且由于宗教势力和“权威学者”的压制和反对，尼人化石

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一百年来古人类学的新发现，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无比正确，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灿烂光辉。

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尼人化石和其他的古人类型的化石以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确立了尼人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地位，把人类历史向前推到一、二十万年之久。

早在 1868 年，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就曾预言，在化石记录上一定存在过一种猿和人之间的过渡类型，他称之为“无语猿人”（没有语言的猿人）。对于这个后来证明是有猿人存在的科学的假设，德国的“学术权威”维尔和攻击为没有事实根据，但是它却在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心中激起了希望。这个青年科学工作者就是荷兰的青年医生杜布瓦。他受德国和英国科学界中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和鼓励，积极地想寻找这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缺环”。特别是海克尔的著作对他影响较大。海克尔曾强调长臂猿的某些解剖特征与人的特别相似。当时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地处热带，是很多种灵长类特别是长臂猿和猩猩之家，因此杜布瓦就来到了这里。

经过数年的努力，1891—1892 年杜布瓦终于在爪哇找到了人的头盖骨和大腿骨化石。头盖骨带有明显的原始性状，如眉脊粗壮，头骨低平，骨壁很厚，面部和牙齿都比较粗大，脑量不过八百毫升左右；而大腿骨则和现代人很近似，表示已能像现代人那样地直立行走。于是将其定名为“直立猿人”，他相信直立猿人是现代人的先驱。

1895 年，杜布瓦带着爪哇猿人的标本回到荷兰，把它公之于世，立刻引起了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爪哇猿人是人，虽然比较粗壮一些。杜布瓦本人认为它是猿和人之间的过渡类型。维尔和以及受他影响的人则认为它根本不是人，维尔和认为它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的长臂猿。

以后几年中，意见、看法愈来愈多：猿，人，过渡类型，白痴，畸形的人……。

当时怀疑和反对来自各个方面。有人怀疑这些化石的地质时代；有人不相信一根肯定是人的大腿骨怎么能与象猿的头骨配在一起；而宗教势力则更是极力反对，他们仍然坚持说，亚当才是人的祖先，爪哇的这个半猿半人的动物根本不可能是人的祖先。

1929 年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以后在同一个山洞里不仅发现了更多的猿人头盖骨和一些肢骨，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用火的遗迹，于是猿人是早期的原始人类的论点才逐渐被广泛接受，猿人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地位逐渐被确定。这就把人类历史向前推到了五十万年。（以后由于相对和绝对年代的测定而推到了大约一百万年，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可能早达大约二百万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爪哇直立猿人化石的发现者杜布瓦在他死前三年（1937 年），由于受到强大的压力，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否认他的发现是猿人，而只是一种硕大的长臂猿，由此可见，唯心主义对他思想影响之深。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和大腿骨也和爪哇猿人的类似，头盖骨具有明显的原始性状而肢骨则和现代人相似。在三十年代，国外（如法国的布勒和沃弗锐）曾有一种解释，说什么周口店发现的化石代表两种人，头骨代表一种原始的人，而肢骨和物质文化（石器和用火遗迹）则代表一种进步的人，头盖骨是进步的人猎取来取食脑子后遗留下来的。直到最近，西方国家出版的书籍有的还在传播这种说法。这种解释显然是企图为弱肉强食的种族主义提供历史根据。以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现于东非的坦桑尼亚，种种事实表明，这是猿人体

质形态的一种普遍现象。现在，猿人化石已在亚、非、欧各洲的许多地点发现，特别是在我国，不仅北京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有了更多的发现，还有比北京猿人更早的陕西的蓝田猿人化石和石器、云南的元谋猿人化石和石器以及湖北郧县的猿人化石和大冶的石器，在贵州黔西观音洞也发现了猿人阶段的石器。恩格斯的理论使猿人的体质形态的不平衡现象得到了正确的解释。由于劳动，四肢首先向现代人的方向发展，脑子是随着发展起来的，所以猿人头部还带有较多的原始性状。

从 1924 年开始，在南非（阿扎尼亚）发现了比猿人更早的南方古猿的化石。由颅底和肢骨等化石判断，南方古猿已能两足直立行走，虽然还不完善。但是头部还很原始，脑量平均不过五百毫升，在现代大猿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同样由于进步的肢骨和原始的头骨相结合，于是南方古猿究竟是属于猿的系统还是人的系统，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近十多年来，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许多地点，有了南方古猿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在我国湖北建始也发现了可能是南方古猿的牙齿。这些发现肯定了南方古猿类与人的系统的关系。南方古猿类的年代从五百多万年到大约一百万年前，在大约三百多万年前，其中一些进步的类型发展成为完全形成的人，开始能制造工具，进入了早期猿人的范畴，可能的代表如肯尼亚发现的“1470 号人”和坦桑尼亚发现的“能人”等，其余的南方古猿则特化成为人科的旁枝。

从本世纪初开始，在南亚和东非等地还陆续发现了一种古猿化石，叫腊玛古猿。它们大约生活在 1400—1000 万年以前。从形态特征来看，它们已从猿的系统分化出来。某些体质形态特征和后来出现的完全形成的人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有人推测它们已具有初步直立行走的能力，可能已会使用天然工具谋生。关于它们的系统地位，目前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它们很可能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期间的生物”，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早期的代表，而南方古猿的某些早期类型则可能是这个阶段晚期的代表。至少它们是接近于这些过渡类型的化石。

这样，从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的早期类型、1470 号人及能人、爪哇猿人、北京猿人到古人、新人一系列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发现，辩证地展示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以及随后的人类发展，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在人类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力地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论断，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起源研究的无比巨大的指导意义。我们相信，随着更多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发现和研究，必将进一步证实、丰富和发展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的伟大理论。

四、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新发展和 人类起源研究中提出的新问题

在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以后，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有很多有关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起源理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进一步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毛主席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从实践的观点

出发，毛主席在《实践论》的最后一段中说：“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这里毛主席特别指出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在两个飞跃中的作用。

《实践论》是毛主席在1937年7月写的。十个月以后，即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又提出了“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的论断。毛主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自觉能动性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能力的增强和发展。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奠定了马列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明确了人类起源理论研究的方向，为劳动人民提供了向剥削阶级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这些年来，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发现，增加了我们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新认识。同时，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围绕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以及由于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类起源理论论述的不同理解，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开展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主要有下列几个问题。

1. 关于过渡阶段的问题

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开始和结束以什么为标志？是在制造工具之前还是之后？怎样理解这个过渡阶段？是否是亦猿亦人性质的阶段？是属于猿的系统、还是人的系统？什么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和什么是“完全形成的人”？

2. 关于劳动的含义问题

是否存在天然工具和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使用天然工具是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还是如有人认为的，也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劳动？

3. 关于人类各种基本特征发生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人类各种基本特征，如直立行走、劳动、语言、意识、社会等是与制造工具同时产生的？还是在制造工具之前陆续产生的？或是在制造工具之后陆续产生的？

4. 关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猿人、古人是原始群，新人开始是氏族公社。另一种意见认为，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是原始群，实行杂乱性交的关系，猿人是前氏族公社，开始血缘家族的婚姻，古人开始是氏族公社。

5. 关于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量变质变问题

我国解放以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就成为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认真读书，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运用这个理论结合人类发展的历史事实批判了孔老二、林彪的“天命论”、“天才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广大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的结合，我国又有着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材料，人类起源的研究在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围绕人类起源学说的阶级斗争

王 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一百年前，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写作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光辉文献，总结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成果，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全面地、精辟地论证了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说的基础。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并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过渡到社会辩证法的研究，提出人类要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最终地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的光辉思想。

在恩格斯写作这篇光辉文献的那个时代，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遗迹证据还发现得很少。近百年来，大量的古猿化石、古人类化石和原始工具的发掘与研究，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这一科学论断的无比正确。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意义，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今天，我们认真学习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这篇光辉文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人类科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有着它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科学与宗教神学这样两种根本对立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人类起源的任何一种学说的提出都程度不同地受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所支配，并为该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历史上，各个时代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渗透到人类起源学说中，表现为各种人类起源学说之间的斗争。围绕人类起源和发展学说的斗争，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史。

在远古时代，原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都很低下。人们对于人类本身起源的认识也是极为朦胧的，因而不可能揭示人类起源之谜。虽然在这个时期，曾产生了不少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而流传至今。如我国古代的女娲抟土造人、古埃及的赫奴姆用泥土塑人等。“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马克思全集》，12卷，761页）“……，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矛盾论》）

到了阶级产生之后，这些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被剥削阶级加以夸大和渲染，渗透了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有些则成了宗教迷信——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样，原先的神话传说就成了剥削阶级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一种思想工具。在一些宗教著作，如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说”、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印度婆罗门僧侣的《摩揭提法典》等，

都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上帝(或其他神)”是如何创造人的。除了神化之外，其不同还在于：上帝所造出来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了，而是在一开始，神就造就了富、贵、贫、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样等级绝然分明的人。例如，我国流传久远的女娲抟土造人，在原来的神话中只是讲造人，并没有讲造出来的是什么人。后来就渐渐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孔老二等儒家之徒所歪曲，将其歪曲为女娲一开始是抟土造人，后因太累，就用绳从泥土中甩出泥土来造人。这样就有了两种人：一种是捏出来的人，命该享福；另一种用绳从泥土中甩出来的人，命该受苦(见《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女娲“引绳于泥之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红人也。”)。孔老二所宣扬的“天命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都是这类货色。董仲舒胡说人类是由“天”(他的上帝)按照“天”的意志和形象创造成的。所以，“天”有三百六十五天，则人就有三百六十五块骨头；一年有十二个月，则人有十二个大关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总之，在他们看来人是“天”造的，一切都是“天”安排好了的，人只能听“天”由命。所谓“富贵在天，生死由命”就是儒家的反动说教。这些反动的神创人说，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扶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人类起源学说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与此相对立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一些具有自发唯物主义思想的进步科学家，他们在同自然界作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地认识到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提出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人类起源学说。如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人是由鱼(鲨鱼)变来的”见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有人提出：“青宁(竹根虫)生程(豹)、程生马、马生人”的见解；汉代劳动人民在一块画像石上刻有鱼、猿猴、人的图象，大致描绘了从动物到人类的演化途径；汉代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王充，则提出了“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倮虫三百，人之为长”的见解。这些认识都包含有正确的因素。同神创造了人的胡说，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但由于它们都还只是直观的臆测，因而无法战胜唯心主义的神创论。

人类学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一开始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切反动阶级总是维护唯心主义的“神创造人”的胡说，对唯物主义的人类学说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古希腊的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五世纪)，提出了人是由其他动物“变”来的见解；并说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在于人有双手的缘故。这样，就亵犯了当时奴隶主统治阶级所信奉的阿林比克多神教中关于“上帝造人”的教义，被雅典法庭判处了死刑。幸得多方营救才得免，但仍被驱逐出境，死于异乡。

十六世纪时，比利时著名医生维萨里，根据自己解剖人体的知识，证实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数目都是相同的，都有 24 根。1543 年，维萨里发表了《人体结构》一书，书中揭露了上帝创造人体的谎言，引起了天主教教会的惊恐。因为根据《圣经》上“创世纪”所载：女人(夏娃)是上帝用男人(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的。所以男人应当比女人“少”一根肋骨，这是教义中规定了的。这一胡诌现在却被维萨里所揭露了。为了掩盖这一破绽，教会诬蔑维萨里为巫师，攻击他渎神，咒骂他为疯子，焚烧了他的著作，剥夺了他的全部财产，判处了他死刑，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只是后来，他被迫答应去耶路撒冷圣地“忏悔”，才免遭了杀害。但途中船只失事，他飘流到荒凉的海岛上而死去了。

十七世纪时，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瓦尼尼只是说一切皆变，人类也是变化来的，并非永远象现在这个样子。就被指控犯放荡不羁、败坏青年的罪名，而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割去舌头，再用火活活烧死。

宗教神学对于进步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杀戮。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有几十万不相信《圣经》的人，相继被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判处了死刑和遭受终身监禁的迫害。不少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人类起源学说被扼杀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人类起源学说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逐渐地产生了。“上帝造人”说受到愈来愈烈的冲击。

十八世纪末，法国科学家拉马克对“上帝造人”说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提出了人是由某种高等猿类变来的学说。他同居维叶的“上帝造人”说的斗争，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中对立阶级的政治大搏斗。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反映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封建主义行将崩溃、新兴的资产阶级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斗争产物。卓越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思想，对于拉马克进化论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热情欢呼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并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写过对这次革命的热烈献词。他用自己的学说为革命政权服务，因此，触犯了法国封建统治阶级和教会的利益。在法国封建王朝复辟后，招致了反动统治者对他的迫害和冷落。最后，拉马克双目失明，在贫困和孤独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进步学说也被湮没了。

而拉马克的对立面、反动的神创论的信奉者和灾变论的提出者居维叶，这样一个政治上反动、思想上顽固的虔诚宗教徒，无视科学事实，将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发现和解释，附会于宗教教义。法国的一位著名文学家 B. 顾沃在他的小说《被压迫者》中评述说：“居维叶用一只眼看‘圣经’，用另一只眼看自然界，力求有助于反动的伪善者，使发掘的材料与‘圣经’上的条文一致，强迫柱齿象去搪塞摩西”。居维叶胡诌说，现代人类是距今五千年前所经历过的一次大灾变之后，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居维叶就是用这种荒谬透顶的捏造，来与《圣经》上所记载的“诺亚洪水”相合。他的观点代表了反动阶级的利益，受到了教会的推崇；他攻击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受到法国封建复辟派的嘉奖，被晋升为贵族。1830 年 7 月 19 日，在法国巴黎，拉马克的后继者圣提雷尔与居维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由于宗教神学和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支持，加之其他的一些原因，进化论学说被扼杀了。

新的发展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于英国。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亲自参加的科学实践，在总结前人的科学成就基础上，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学说。达尔文于 1859 年发表了著名的《物种起源》，第一次把生物学置于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在该书中明确指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物种起源》，1972，320 页）。英国年青的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坚定地拥护和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并根据比较形态学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人类与猿类存在着共同祖先的理论。这是人类起源认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投入宗教神学的神创论死水塘的一块巨石，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切反动势力都麇集在宗教门下，向“人猿同祖论”学说进行了疯狂的反扑。1860 年 6 月 30 日，在英国牛津，展开了一场赫胥黎和大主教威尔伯福斯的著名论战。反动阶级之所以选定威尔伯福斯主教来担任对进化论进行疯狂反扑的急先锋，是因为他年青时曾获得牛津大学数学院的头等奖，被认为是对自然科学各个部门无不通晓的。由他来维护正统的教义，更能迷惑人。但是，即使宗教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也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由于赫胥黎长期来坚持向人民群众宣传和普及进化论的结果，进化论学说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这场论战中得到了全面的胜利，反扑被彻底击溃了。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动物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人与猿存在着共同祖先的理论确立了。